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

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

1931~194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解放前补习学校党史征集组编辑

1991年11月

上海解放前补习学校党史征集组

组 长 邵洛羊

组 员 顾乃文

黄 浦

俞正平

程 豪

卢 栋 华

艰苦的工作
丰富的经验
巨大的贡献

孙起孟

1991.9.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起孟题词

源远流长

救國有領導 青年意氣邁
奮力量才志 知識亟嚶求
砥礪舉雙手 立信振神州
輝煌史蹟在 寰宇共謳歌

李文杰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於北京
時年八十有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文杰题词

题 后 记

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党号召兴办补习学校运动，组织领导职业界青年，进修专业知识，作为骨干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就宏伟。杰忝任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追随党内外人士黄炎培、李公朴、沙千里、潘序伦、姚惠泉、许德良、黄逸峰、顾准、王文清(纪华)同志之后，在中华职业、量才、神州、立信等补习学校及中华业余图书馆、现代知识讲座等单位，滥竽董事会或者讲师席位，勉贡绵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往事，故旧萧疏，感想万千；面对现实，国旗昌隆，意气风发。欣看《上海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出版，漫吟五律一首，祝颂功德。

李文杰

育德育才
開革命

王尧山

一九五八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資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王尧山题词

勤學勤業
團結進步



張承宗



一九九一年秋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張承宗題詞

继承和发扬
优良传统为
振兴中华培
育人才

陈一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学生运动史料征集组组长陈一鸣题词

前言

陆志仁

我国的职业教育开端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至二十年代，则已推广到全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在这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较大发展的机会，迫切需要新式工厂、企业、银行等方面的管理人材和技术人材。兴办职业教育，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1917年5月黄炎培在上海民族资本家张元济、钱永铭、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等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又于1918年9月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设立了铁工、木工等十余个科目，并出版关于职业教育的译著和刊物。不几年，职业教育推广到全国，蔚为风气，取得显著的成绩。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黄炎培专程到北京访李大钊畅谈，“就国内、国际大局交换意见，次谈怎样做法。大钊说：我们看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唤起民众。只是在做法上，你们重教育，我们教育外还重组织，我们密切联系罢”。（黄炎培：《八十年来》）。李大钊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既肯定职业教育的进步意义，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只是昙花一现。“欧战终了，国际贸易失败而实业骤落，历年政治纷争，军阀战争不绝”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不得不经历荆棘丛生、艰难险阻的路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黄炎培还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中华职教社也曾一度被捣毁，使他终于认识到“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重大的转变，他把职业教育和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联系起来，他说：“到二十年(1931年)是我一生思想和行为急剧转变的一年。”他热情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目标“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并认为教育的立足点，不仅在满足实业界的需要而且要适应工农民众的需要。因而从1932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又络续举办了多所补习学校，广泛吸收在业的店员、职员、学徒、工人及一部分失业失学青年入学。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黄炎培曾把陶行知和李公朴推荐给史量才，帮助史量才主持的《申报》馆办了许多进步文化事业。其中李公朴受史量才委托于1933年秋办起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史量才被害后，改名为量才业余补习学校)。这个学校设在南京路商业中心区，其用意就是为了便于使广大青年店员就学。与此同时，以推行新式会计，训练在业会计人员为职志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也以多种形式扩大了办学规模。各界社会团体如上海市商会，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蚁社等也纷纷举办职工业余补习学校。一时间，以职工为对象的职业补习学校风靡全市，其总数不下百余所，入学职工人数也达数万人。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广大职工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学习文化的积极性，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职业教育家已经从过去鄙视补习教育的看法中改变过来，认识到各种补习教育对于有志求学的青年职工来说，更适用，更迫切。

为了更全面的说明“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上海补习学校广泛兴起和补校学生运动热火朝天般开展起来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可以从下列三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变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民族资产阶级表现了抗日的积极性。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严重

危机面前开始脱离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站到抗日阵营中来。特别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以史量才为代表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者和金融界人士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人民一起全力支援十九路军，抵御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抗战达一月之久，这和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地力图绞杀上海军民抗日斗争的卖国行径，成为鲜明的对照。此后，《申报》在史量才主持下，继续发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一系列评论，和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史量才还依靠进步知识分子，如陶行知、李公朴、戈公振、胡愈之、金仲华、黎烈文等举办了许多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报刊和社会文化事业。尽管史量才于1934年11月被蒋介石集团所暗杀，但他坚决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事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革命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扩大。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上海革命文化运动曾遭受严重摧残，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九·一八”后，全国形势起了变化，促使许多主张改良主义的，但是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而逐步转到革命方面来，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邹韬奋。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在“九·一八”前是一份专谈青年职业修养的刊物，“九·一八”后急剧转变为一份政论性刊物，韬奋撰写的评论文章主张坚决抗日，并以犀利的文笔，鞭鞑了蒋介石政府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政策。这一转变，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刊物的发行量迅速上升至十五万份，它号召的援助东北抗日军队及东北义勇军的捐款共达十七万元，可见读者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内负责中央宣传部的张闻天也发表文章提出要克服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文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开始突破“左”倾束缚的一个标志。这两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党外知识分子的转变，一个是党的政策的转变（从当时王

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来说，这种转变远不是全面的和彻底的，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实际工作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大壮大的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阵容，加强了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文化教育战线的各个领域，如文艺、戏剧、电影、音乐、歌咏、美术以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都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非但没有将革命文化消灭，反而锻炼了它的斗争，加速了它的发展。

三、上海职工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迅速高涨。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集会、游行请愿、发表通电、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接着“一·二八”战争爆发，十九路军违命抗战，上海人民和工人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热烈支援前线，开展巨大的捐献运动。沪西日本纱厂四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与各业职工组成万名义勇军，投入战地服务，分别担任运输、筑路、通讯、救护、除奸等任务，一部分义勇军（如煤业职工）甚至协同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在宝山前线作战。各业职工又根据本行业的条件和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如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轮起卸军火和军需品，店员广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等。上海军民的抵抗，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出卖而归于失败，但却坚持了三十二天，给骄横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加强了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上海职工在抗日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共产党、共青团及党的外围组织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也有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束缚，未能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受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的抗日民主力量）而使自己陷于一定程度的孤立，但共产党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主张，终于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党的影响扩大了，这就为以后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三方面的历史条件下，职业补习学校的兴起显然有其特殊意义。它既为广大职工提供了学习文化技术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又为职工运动和革命文化运动的汇合交流提供了一种比较合适的组织形式。补校的特点是，设立的课程多，如量才、中华职业、立信等校设立的课程多至二、三十种，上课时间分晨、午、晚三种班次，入学程度分为从高小、初中、高中多种层次。这样，就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条件、不同学历的青年职工创造了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就学机会。所以上述量才、中华职业、立信三所补校入学学生各有数千人，其中量才达五千人。除课堂教学外，补校当局还十分重视图书馆、进步报刊和学术讲座的教育作用。李公朴主持的量才流通图书馆，设有读书指导部聘请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伍康成等担任指导，他们是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通过读书指导来传播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并且把他们和读者的通讯，择要发表在《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他们还兼任量才补校的教师，这样使学术工作者与职工群众，理论和实践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艾思奇编写的通俗哲学著作《大众哲学》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工作的成果。当时，中华职业育教社举办学术讲座，听众多数是补校学生，讲演者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周刊、《永生》周刊，都是一个接着一个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也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出版，这都是邹韬奋及其战友主编的刊物。它们在补校学生中拥有最大量的读者。补校的学生组织，如学生自治会、同学会、校友会等也在校方及教师的支持和指导下，主办了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演讲会、时事讨论会、诗歌会、演剧团、口琴组、歌咏班、哲学研究小组、新文字、世界语组织等，参加者约有数千人。被邀参加上述活动作讲演和指导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沈兹九、关露、艾思奇、柳湜、冯定、王任叔、萨空了、范长江、王芸生、等著

名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作家和社会科学家。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人民奋起响应，先后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工人救国会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中，以量才补校为主的补校学生走在前列，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为该救国会的骨干力量之一。中华职教社、立信补校、量才补校的教职员工参加救国会的为数也不少，其中李公朴曾是文化界救国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理事、潘仰尧是职业界救国会的理事。邹韬奋先生后来在《患难余生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大本营。”这里说的南京当局就是指国民党当局。我们姑且不去评价量才补校学生运动可否称为“民众运动的大本营”，但它和《大众生活》周刊一样受到国民党严重注意这个事实本身，也就说明了它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战斗作用。这种作用是有多种因素形成的，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三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外，重要的是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包括“左联”、“社联”、“教联”、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共青团等）加强了活动。当时，补校学生的救亡运动就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坚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得到发展和壮大的。在补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爱国青年职工，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就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各界战时服务团，随后有转移到企业、商店、工厂团结职工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奔赴延安或大后方的，也有一批辗转参加到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他们都在伟大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并为此而献出宝贵的生命。

“八·一三”沪战结束后，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量才补校停办，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由姚惠泉主持，办了七所补校，学生总数达两万余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第四中华补校，入学职工达五千人。几个团体合办的中华业余图书馆也设在第四补校内。这所补校成为抗日时期上海补校学生运动的重心。立信会计补校在“孤岛”时期仍然坚持办学，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曾一度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校。除此之外，在当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通过各种群众团体举办了如下几种类型的职工补习学校或政治训练班：

一、由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在“孤岛”时期，它的活动是半公开的）主办了“现代知识讲座”。听讲的都是由各进步群众团体推荐来的积极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听讲十分认真，讲师也都是著名学者、教授李平心、孙冶方、周予同、胡曲园、梅益、冯宾符、于伶、陈望道、李文杰、吴大琨等，讲授内容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欢迎。讲座是以姚惠泉主持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名义举办的，前后办了三期，历时十个月，学员共有800人。这个讲座实际上起了干部训练班的作用。“职协”还办了上海神州夜中学，其课程内容也偏重政治教育，该校无线电专科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是去新四军服务的。神州夜中学只办了二年就被迫停止了。

二、由职业界各群众团体主办的补习学校，有银联补习学校（金融业职工）、华联补习学校（外商企业职工）、益友补习学校（各业店员）、药联高级药学职业学校（西药业药剂生）等十余所，这类补校一般有自己的特定对象，作为各团体的附属事业，得到上层份子和职工群众的支持，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仍然能坚持不殆，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这本史料选辑中，我们收入的“益友”和“药补”二篇，是典型性的材料。）

三、由补校同学会主办的“中华职工义务夜校”及“知行义务

夜校”这类学校接收的学生，比之一般补校学生，在职业上更为分散，工资待遇更为微薄，文化程度更低，一部分还是失业失学青年，但他们对学习的要求却更为迫切。所以，采取义务办校的方式，才能适合他们的条件。学校的教师在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团结学生，争取部分民主人士如黄延芳、陈已生等的支持，筚路蓝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

四、学生界的党组织主办的补校，有树群义务夜中学、慕尔堂补习夜校、中国职业补习学校。这类补校的学生运动，大致带着青年运动的特点，政治色彩比较突出，活动方式灵活多样，与校外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比较密切。

从上述情况可见，从抗日战争初期以来，上海补校的学生运动无论在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或者其它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具体指“职委”和“学委”)加强了领导，在补校教职员中和学生中党的力量也增加了，在学生比较集中的补校中，都有党的支部。这样，就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精干荫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得以贯彻执行。当然，补校工作受到时局的制约，也是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在上海“孤岛”时期，由于全国处于抗战高潮中，租界内的抗日运动有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可资利用，补校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学生运动出现了高潮，到1939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补校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大批转入新四军，一部分留在上海开展基层工作，补校学生运动的规模趋于收缩，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民族工商业以至英美企业进一步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管制、强占，大量职工失学失业，补校学生运动随着进入低谷，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补校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仍然做艰苦的工作，团结群众，坚持补校这块文化阵地。所以，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补校学生运动又走向高潮，通过补校，职工的文化技术水